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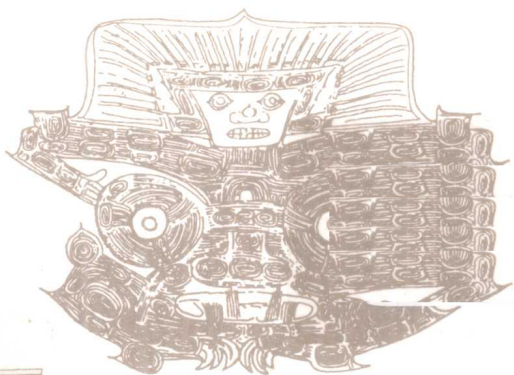
中国 古代史

(第二版) / 上册

赵毅 赵轶峰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夏	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
商	约前16世纪—约前11世纪
周	前11世纪—前256
西周	前1046—前770
东周	前770—前256
春秋	前770—前476
战国	前475—前221
秦	前221—前207
汉	前206—公元220
西汉	前206—公元8
新	9—24
东汉	25—220
三国	220—280
魏	220—265
蜀汉	221—263
吴	222—280
晋	265—420
西晋	265—316
东晋	317—420
南北朝	420—589
南朝	420—589
宋	420—479



中国古代史

Zhongguo Gudai Shi

第二版

上 册

赵毅 赵轶峰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内容简介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编者突破以社会发展史演绎逻辑编写中国古代史的方式,采用以中华民族的文化表现和中华文明总体经历为线索的体系,更好地表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经历中最值得注意的知识内容,并在教材中贯彻了培养良好公民心智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全书内容丰富,文笔清新,具有启发性。自2002年第一版出版,该教材经全国多所高等学校采用,获得普遍认可。修订后,全书分为导言和正文7编,各编有引言、小结、复习题、深入思考题和扩展阅读书籍要目,覆盖了从旧石器时代到鸦片战争的中国历史。本次修订吸取了国内多所高等院校专家学者、学生和一般读者的反馈意见,保持了第一版已经确定的基本体系、主导线索、篇章结构,同时对一些章节内容分量做了合理化调整,重新整理了复习思考题,更正了个别知识性错误和错讹字句,并分为上下两册,以便分两个学期教学使用。从整体上看,新版教材不仅大幅度提高了本科教学适用性,而且更加便于研究生复习考试的参考需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史.上册/赵毅,赵轶峰主编.—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

ISBN 978-7-04-028821-6

I. ①中… II. ①赵…②赵… III. ①中国—古代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K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8620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本册印张 24.25
总 印 张 50.5
本册字数 450 00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http://www.landr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版 次 2002年12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2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2次印刷
总 定 价 69.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8821-00

目 录

导言	1
一、中国历史的自然基础与人文特征	1
二、中国历史演进的历程	4
三、本书的编写思想和使用要点	32

第一编 中华文明的起源

引言	37
第一章 远古人类在中国的足迹	39
第一节 中国大陆的人类起源	39
第二节 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发展序列	40
第三节 关于中华初民的神话传说	48
第二章 中华文明的发生	52
第一节 农业在中国的起源	52
第二节 仰韶时代的经济、技术进步	54
第三节 仰韶时代的社会结构	56
第四节 龙山时代中华文明的初曙	60
第五节 “五帝”传说与中国的“英雄时代”	66
第三章 夏文化与夏王朝	68
第一节 考古学中的夏文化与夏朝的建立	69
第二节 从启到桀：夏王朝的兴亡	71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反映的夏代社会生活	74
复习题	79
深入思考	79
延伸阅读书提要	80

第二编 商、周：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

引言	83
第四章 商：辉煌的青铜文明	87
第一节 商族与商王朝的兴亡	87
第二节 商人的信仰和商代国家制度	93
第三节 中原及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	99

第四节	殷墟文化遗存反映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	100
第五节	甲骨文与中国早期的文字	105
附表:	商世系、兄终弟及的商王	107
第五章	西周: 系统国家理念的确立	108
第一节	稷殖百谷与周族早期的历史	108
第二节	武王伐纣与周初的分封	111
第三节	周公的业绩与人格典范	114
第四节	周王朝对周边地区的拓展与经营	115
第五节	礼乐制度与周王朝的社会政治秩序	117
第六节	宗法制度与社会组织关系	120
第七节	世卿世禄与官僚制度	122
第八节	刑法与军事体制	124
第九节	井田制与经济形态	126
第十节	周人的观念世界	128
第十一节	西周王朝统治的结束	130
附表:	西周世系	131
第六章	春秋: 制度的嬗变与精神文化的探索	132
第一节	周王室的衰落	132
第二节	诸侯争霸与春秋政治格局	134
第三节	经济形态的变迁	142
第四节	孔子的古典政治哲学	144
第五节	老子: 自然的智慧	147
第六节	墨子与平民价值体系的形成	149
附表:	春秋鲁国世系	151
第七章	战国: 百家争鸣与大变革的时代	152
第一节	变法运动与新社会体制的形成	152
第二节	七国争雄与秦的统一	163
第三节	铁制工具与农业的巨大发展	172
第四节	土地私有化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173
第五节	都市生活的繁荣	175
第六节	中原华夏与周边各民族的互动	176
第七节	孟子、荀子与儒家学说的演变	178
第八节	庄子: 道家学说的继起者	183
第九节	韩非子与法家学派	184
第十节	士阶层的兴起与稷下学宫	186
	复习题	188
	深入思考	189
	延伸阅读书提要	189

第三编 秦、汉：国家政治的大一统时代

引言	193
第八章 秦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及其覆亡	197
第一节 秦始皇的统一	197
第二节 官僚制与郡县制：秦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两大支柱	201
第三节 《秦律》	202
第四节 焚书坑儒与文化专制	206
第五节 陈胜、吴广领导的反秦大起义及楚汉之争	208
第九章 西汉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	214
第一节 封国制与“七国之乱”	214
第二节 “文景之治”与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217
第三节 从崇尚黄老到“独尊儒术”	223
第四节 官僚体系中的察举、征辟与监察	225
第五节 汉律与社会关系结构	228
第六节 汉武帝的内外经营	233
第七节 丝绸之路及汉朝与周边区域的联系	242
第八节 西汉末年的政治衰败与王莽改制	244
附表：西汉帝系	248
第十章 东汉：从“中兴”到腐朽	249
第一节 绿林、赤眉起义与“光武中兴”	249
第二节 世家大族的兴起	254
第三节 政治改制与外戚、宦官专权	257
第四节 清议与“党锢”	259
第五节 东汉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261
第六节 黄巾起义：一个长期政治纷争时代的序幕	264
附表：东汉帝系	267
第十一章 科学技术、宗教与文化	269
第一节 天文历法与算学	269
第二节 《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271
第三节 扬雄、司马相如与汉代文学	273
第四节 《史记》与《汉书》	277
第五节 经学、谶纬之学与王充的唯物论	279
第六节 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萌芽	283
第七节 长安与洛阳	286
复习题	288
深入思考	289

延展阅读书提要	289
---------------	-----

第四编 三国两晋南北朝：各民族 间的冲突与大融合

引言	291
第十二章 三国鼎立	293
第一节 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	293
第二节 曹操在北方的经营	298
第三节 孙权与东南豪强势力的联盟	301
第四节 诸葛亮对西南地区的开发	304
第十三章 两晋交替与南朝经济的繁荣	308
第一节 占田制、九品中正制与士族势力的兴衰	308
第二节 晋室播迁与汉族文化重心南移	313
第三节 祖逖、桓温的北伐，淝水之战及东晋的衰亡	317
第四节 南朝政权的兴替	323
第五节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繁荣	327
附表：西晋帝系、东晋帝系、南朝帝系	331
第十四章 十六国北朝：北方民族的崛起及其和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333
第一节 北方各族政权的兴亡	333
第二节 鲜卑拓跋部的崛起与北魏孝文帝改革	341
第三节 北朝的政权更迭与北方的统一	345
第四节 均田制、租调制和府兵制	348
第五节 北方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大融合	351
附表：十六国兴亡简表、北朝帝系	354
第十五章 民族融合时代的文化成就	356
第一节 儒学的困境与玄学的兴起	356
第二节 佛教、道教的发展	359
第三节 敦煌、云冈、龙门石窟	363
第四节 六朝都城建康	364
第五节 历史学、地理学与文学艺术	366
第六节 科学技术	371
第七节 社会生活习俗	373
复习题	376
深入思考	377
延展阅读书提要	378

导 言

一、中国历史的自然基础与人文特征

中国人今天生活着的这片土地有 960 多万平方公里。她东邻朝鲜，南接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西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接壤，北连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中国大陆有 18 000 多公里的海岸线，与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隔海相望。这片土地是中华民族在古代先民生息并创造了灿烂文明和辉煌历史的环境和舞台。中国历史的许多特征都和这片土地的风貌有深深的联系。当我们回顾中国历史的时候，应该首先仔细地审视一下这片土地。

中国大陆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以昆仑山脉、祁连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为骨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 000 米以上，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由青藏高原向东，包括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它们大体南北通贯，平均海拔约 1 000 ~ 2 000 米，构成了中国地形的第二级高原地带。以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为主体的中国大陆东部一线，为海拔 1 000 米以下的丘陵和平原地带。这种三级阶梯式的地势结构和它们各自的生态气候环境是形成中国历史文化总体系中区域性差异的一个基本条件。中国的河流大都顺地势由西向东流淌。其中主要的河流长江、黄河、辽河、黑龙江、珠江、松花江和淮河都流入太平洋，雅鲁藏布江和怒江则向南经过印度、孟加拉和缅甸流入印度洋。古代人类文明的稳定发展以人群的定居为条件，因而多与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关系密切。中国古代文明就是在长江、黄河、辽河等适合发展农业的大河流域发展起来的。

黄河全长 5 464 公里，流域面积 75 万多平方公里，属黄土、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它的中上游流域是黄土高原，这里土层深厚，土壤结构均匀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与供水性能，加上土壤具有较高的自然肥力，具有发展旱地农业的基本条件。黄河下游主要流经河水冲刷黄土淤积而成的华北大平原和部分丘陵地带，由于距海较近，降水量偏多，也具有发展旱地农业的基本条件。黄河流域的农业大体上是比较粗放的。长江全长 6 300 多公里，是亚洲第一长河，流域面积达 180 多万平方公里。沿江支流纵横，湖泊棋布，孕育了广阔的平原。这里是亚热带湿润气候，每年平均气温在 15 ℃ 的天气有 175 天左右。土壤为黄色或红色，有机质含量较高，生物资源丰富。丰富的热量资源和

水资源为水稻等农作物的栽培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这里成为人类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经成为人类活动的密集区域。由于土地利用价值较高，气候温和，这个地区的古代农业向劳动密集型发展，并且逐渐成为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辽河发源于燕山北麓和大兴安岭东南麓的夹角地带，它的上游是丘陵地带，中下游则为广袤的辽河平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辽河流域气候温暖，降水量充足，是适合农业发展的区域。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人们对辽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知之甚少，因而相对低估了它在中国历史文明运动中的地位。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辽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和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一样，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体系中具有自身特色的重要分支体系。由于生态环境的演变，这个区域后来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农业与畜牧业结合为特征，它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历史发展的基础。

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一个由自然界提供的自成体系的人类活动的舞台。这个舞台的各个部分之间有巨大的差别，但是其内向交流的地理条件要好于外向交流的条件，它的外缘对于古代的人们来说有不易逾越的交通障碍。中国历史文明的许多重要特征就是以这个舞台所具有的这样一个基本特征为最初的依据而形成的。

首先，这是一个覆盖广大的内陆文明体系。和古代地中海文明相比，这个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突出主题是内向的组织化整合，而不是外向的扩展。所以中华文明早期在国家体制运作和国家政治哲学领域形成贯通的演进现象，形成以华夏共同体之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文化观念，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则相当淡漠。这种类型的古代文明的基础是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则是农业的补充。所以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国家政治精神也体现着农业精神，其突出的表现是体现在国家经济和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农本主义。中国古代的农本主义以对于群体生存基本条件的关注为中心，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关注抽象化和群体的人的价值却忽视个人价值的国家主义的人文精神。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个总体上自给自足同时包容着许多差异很大的经济区域的体系；从政治角度来观察，这个体系以强大的国家权力实现对分散的社会单位的强控制，其演进表现为君主政治的强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官僚政治体系走向完备的过程；从文化角度来观察，则可以看到丰富的多样性、重视生存而忽视发展的传统和重视地缘与血缘关系的倾向。当中国以整体姿态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时候，这个文明传统成为中国独立精神的原发基础。

其次，这个文明的历史表现为一种长时段角度观察下的内聚运动现象。这种现象的要素是，大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发展导致了强大的国家权力，从而强化了人们集体行为的能力和在生产、生活中的创造力。借助这个过程，形成了中

国大地上文明运动的核心区域和主导的文化精神，该核心区域在与周边地区人群的竞争中总体上长期占据上风。这个核心的外部是富有活力的边缘区。边缘区的文化有巨大的活力，并不断地将这种活力带给核心区域，但是其自身的发展却以其与核心区域的关系状况为条件。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有内聚倾向的“场”。这个“场”的整体切面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多样性特征，它的演进过程则体现了华夏文明的整体连续性。这样一个文明的内聚运动使中华文明虽少受外来的挑战，但却不乏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各种复杂形式的矛盾、交往与融合，使得古代的中国人保持了文化进取的强韧和包容精神。这个运动的形式要素是古代的国家、民族关系，其内容则是华夏文化精神在中国地理范围内趋于整体认同。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使中国的历史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到17、18世纪间，这个过程达到了中国行政版图与文明空间基本复合的状态，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

再次，中国历史体现着中国文化宏大的包容精神。在原本联系微弱的众多人类群体走向相互关联的长期历史运动中，形成了中国宏大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既具有整体认同的基础，也包容不同的宗教、价值、习俗和民族传统。和一些单一宗教主导的国家不同，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体系，而是在包容多样并存的宗教元素的基础上发展着的文化共同体。这种文化包容性的基础是不同文化成分不断的融入、对于生存的共同需求、世俗国家组织的强大和古典人文精神历时久远的传承。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从空间上表现为各民族文化和地区性文化体系的并存，从时间上表现为在融合与变异中保持了基本文化特征的继承性，从社会角度上看，则表现为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差异与共生。这种包容的文化精神使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与其他文化体系是可融通的。

最后，中国古代社会是具有开放性的等级社会。人类社会大都建立在一部分人支配其他人的权力结构基础上。对于他人的支配权的主要基础是政治地位、财富、暴力以及传统。这种支配关系在古代以公开的方式实现。对于他人的支配权力在通过法律确认而成为国家制度要素的情况下就成为社会等级制度。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大致有君主、贵族、官僚、平民、贱民、奴隶。这些成分基本存在于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个过程中，其比例和具体的处境与角色则一直处于变化中。这样的社会当然在观念上、法律上和实践中都是不平等的。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又具有开放性。开放性的含义是各个等级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在各个社会等级间有比较强的流动性。这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就开始表现得很明显。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经常的渠道使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得到承认。出身并不是个人价值和命运的唯一决定因素，学识、才能、品德等有可能改变个人甚至家族的命运。与此相适应，中国社会有一个庞大的被称为“士”的知识精英阶层，他们以知识为资本，通过参与国家政治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

位，并且通过自己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把更大范围的社会成员卷入社会等级的流动中来。在观念上，中国人认为所有现实的个人地位都是有条件的，其中包括君主。残暴的君主可以被推翻，贪污的官僚应该受到惩罚，有美德的人的社会地位应该被提高。这种观念中包含一种自由的精神和理性的精神，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民间改造运动不断产生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历史演进的历程

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息、创造、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丰富的多样性并在广阔的时空中展开，我们现在简要地描述出一个大略的框架，以帮助读者把握其轮廓和要点。

从中国历史文明的发生到公元前 16 世纪商王朝建立之前，可以被看做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其中又分为若干阶段。

自距今大约七八百万年的腊玛古猿到大约 170 万年以前的元谋猿人这个漫长的时代，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类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题是人类在体质上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这一部分历史还基本属于自然史。从距今大约 200 万年到大约 1 万年期间，是中国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中国古代的人类发明了以打制石器为主的生活和生产工具，从而为人的心智发展和复杂的社会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时代，人类的社会组织还处于不发达、简单和自然的状态，中国古人聚落遗址发现的工具形态，显示出明显的地方差异性和分区发展的特征。

从大约 1 万年以前到大约 5 500 年以前，是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这个时代虽仍然以生产和生活工具中的磨制石器为突出特征，但是我们的先民已经在创建一个就那个时代而言相当辉煌和复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轮廓。在这个时代，有了以稻、粟种植和家畜饲养为核心的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活动。与以前时代人们的生存方式相比，这种活动的特点是，人们不再限于在大自然中猎取现成的东西来维持生存，开始借助自然条件来创造和延续自己的生存条件，从而自觉地改变自然与自己的关系。中国长江、黄河流域的稻、粟农业是世界四大原发性农业文明当中的两个，对整个人类文明具有深远的影响。人们在这种特定的农业文明的展开过程中大大地开发了自己的心智，从而有了精神文明的诞生。那时的人们已经在从事以自然、图腾和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宗教信仰活动。这种原始宗教的发生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普遍的和特殊的双重意义。从普遍意义上说，上古时代的宗教意识是人类对于自身本质和外部环境的超越个体生存时空的探索和尝试性的解释。这种思索的趋向和能力，甚至其内容，是古代哲学、艺术与科学思维的重要源泉——哲学、艺术与科学思维的另一个源泉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经验。因而，宗教最初是作为人的心智进化和知识扩展

的一个必然环节而产生的。相当程度上以自发的方式形成的上古宗教意识构成了信仰、思维和行为的初始倾向，使后来的历史文明长期地带有其印记。中国宗教的泛神论的特征，中国哲学的自然主义特征，中国人思维的喻指和整体关照的特征，中国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宗法化特征等等，都与中国原始宗教的初始倾向有内在的关联。新石器时代的中华文明已经包含有陶器烧造、绘画艺术和早期的绘图文字。现在看到的各个新石器时期遗址的陶器造型和绘画，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和绘画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显示出人类历史文明发展具有共同的基础。属于新石器时期的纺织物遗迹表明，中国先民是最早运用纺织技术的人群之一。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大批居住建筑、墓葬、仓储遗迹显示，那个时代的人们正在发展起稳定的社会生活组织。母系家庭是常见的社会组织形态，随后父系家庭出现，甚至一夫一妻式的小家庭也有产生的迹象。由各类家庭组合起来的氏族公社构成主导形态的社会体系。人类在社会组织关系中发展起集体行为的能力和价值观，并扩大了人类冲突的基础。新石器时期，我国南北各地的古代文化，保持着分区发展、相互交融的态势。黄河中游、黄河下游、燕北、辽西、长江中游、长江下游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聚集体。

从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包括考古学上所说的仰韶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国家文明发生的时代。这个时代如果从生产工具的质料特征上来认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时的中国先民已经掌握了铜的冶炼技术，所以也被称为“铜石并用”时代。不过铜并没有成为重要的生产工具材质，而是被用来铸造兵器和礼器。玉，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审美价值和坚固性的石料，也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工具材质和礼器材质。以黑色薄胎为特征的陶器也是这个时代生产技术和社会生活质量提高的明显标志。考古学近年关于这个时代的更为引人注目的发现是从黄河中下游到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看到了大量的古代城墙的遗存。城墙的出现有两个直接的理由。一是一个社会共同体防御外部攻击的需要，另一个是同一社会共同体内部角色地位分化的结果。当时城中居民的生活必然依赖城外的生产活动，而许多城址的外部也发现有较小的人群居住遗址，社会内部的分化当是这些城形成的重要原因。这些城墙的营建也表明，集中的权力中心和复杂社会组织体系已然存在。一些城的外部有护城河环绕，这表明对外防御是这些城墙的重要功能。当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分化需要借助于城墙来维持的时候，这种分化就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这个社会共同体的组织结构也就因而具有了国家的特征。和中国古代文献相印证，这些城当是所谓的“国”，而其周边地区则为“野”。从其规模上看，这些“国”中还未必发展起充分的城市生活，所以与后来的“城市”相比，还有重要的区别，应是以政治权力中心为基本性质的。与这些城同样表示集中的

权力中心出现的是，大体在同样广大地域间发现的大量祖先和神祇祭祀建筑群与墓地建筑遗存。这些祭祀中心的崇拜祭祀活动当和中国上古时代礼仪制度的形成有直接的关联。这些墓地中陪葬物品的丰俭差别，则可以印证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的明显存在。这样，在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夏朝建立以前的大约1500年间，中国历史上的早期国家组织已经星罗棋布地在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出现了。现存的文献关于这个时期的历史留下的主要是一些缺乏年代准确性和充满神话和史诗色彩的传说。这些传说可以帮助我们推测那个时代的一些特色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轮廓，但是，我们无法具体地讨论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和历史演变历程。可以肯定的是，考古学在未来的发展将会为具体地揭示中国历史的这个早期文明时代丰富多彩的面貌提供愈来愈可靠的依据。

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大约公元前1600年的夏王朝可以被看做中华文明的前古典时期。我们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还没有达到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充分互证的程度，现存关于夏代的文献记载都是后人追述的，所以将来我们关于这个时代的总体看法还会随着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的发展而改变。大致与此前的历史时期相比较，这个时代出现了中华文明运动的核心区域和围绕这个核心区域而展开的内聚运动。此前的文化群落是分散在广大地域的，各个文化群体处于小规模、地方性的自然状态，其相互之间的关联还没有凝聚成持续性整体历史运动的势能。作为一个地方性文明长期发展的结果，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形成了一个具有内聚力的历史和文明运动的中心。由于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断定这个区域的农业生产水平如何远远超过其他的区域，关于这样一个中心在这个特定区域形成的直接原因的解释，看来还必须着眼于自然的挑战。水患和其他自然灾害严重地威胁着这个地区人类的生存，人们需要集结成为比分散的城邦和氏族组织更强大有力的集体来对抗自然灾害。在这个过程中，超过个别城邦和氏族组织的权威建立起来。保存这种权威的体制就是王权国家。它一旦出现，就自然地具有自我保持和发展的机制。它的发展所带来的庞大的国家体系，形成了对于周边地区的竞争优势和扩展趋势，并且使大规模的集体科技和文化创造活动成为可能。《诗经·商颂·长发》中所说的“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员既长”就生动地描述了在应对自然挑战中生长起强大的国家权力的情况。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王权国家和后来的君主专制体系有重要的区别。这种王权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包容原有的地方性集团势力、血缘氏族组织和自然人群聚落而发展起来的，除了一个有限的核心范围之外，王的权力并没有直接地贯彻到社会中的个人。所以，其权威经常性地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集中的个人权力的增长为权力持有者的腐败创造了条

件，来自自然的威胁的减弱则使人们对国家权威的基础提出更多道义上的要求。在普遍地存在内部和外部分权势力却又必须保持大规模国家行为能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更大挑战的情况下，关于王权统治的道义合法性的观念，即“德”的观念，作为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在夏朝的统治者失去道德合法性的情况下，商朝取代了夏朝。这个过程固然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但是商汤充分地运用了关于王的道德准则来发动各种社会势力推翻夏朝的统治。在存在普遍的原始宗教情绪的时代，这种人本的道德准则和所谓“上天”的意志结合在一起。在商汤讨伐夏桀的檄文，即《尚书》的《汤誓》中，商汤历数了夏桀的种种残暴失德的行为，声称要代表上天来拯救夏民，使推翻夏王的反叛成为合乎道义和不可抗拒的事情。后来史籍所云“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越绝书》卷3），追述了这种情况。

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统一的帝制国家之前的时期，大致相当于包括春秋战国在内的商周时期，可以被看做是中国历史文明的古典时代。把这1400多年的历史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是着眼于中华文明的整体性的原始特征在这个时期相当充分地建立了起来，而这些特征成为后来中华文明演进的原点。

这个时期对于中华文明的组织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变化是与宗教精神相结合的国家政治伦理的发展。反映夏代社会状况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有作为人神交感媒介的卜骨出现，商代的卜祝之官则成为国家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现存甲骨文中大量的与国家决策相关的卜问祝祷内容，几至于无事不卜。祭祀活动也是商王室频繁举行的宗教活动，其主要对象是包括天、地在内的自然神和祖先，其根本意义在于与超现实权威之间的沟通。在这个时代，从事宗教事务的人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角色，巫者可以成为国家机关中的相，早期的天文历法和医药知识也是由宗教人士传承的。鉴于甲骨文和宗教的关系密切，巫在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应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反映了以巫祝和自然神崇拜为特征的宗教政治和后来发展起来的礼仪政治中间存在着矛盾，也反映了商、周两代宗教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有重要的变化。与周代相比，商代的政治伦理更多地被原始宗教精神所笼罩。

商代国家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方国联盟。居于王城的王直接控制着一个由贵族、祭司与官僚共同组成的中央国家机构。以这个中央国家机构体系为中心，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文典章制度，所以《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个国家体系还鲜明地带着氏族制度的色彩，王位的继承必须满足家族内承继的条件，但是在长子、幼子间并无严格规则。商王直接控制的人民，还

以宗族集团为单位，整体地和商王发生关系，对王提供劳役和兵役。王城以外的方国拥戴王室，提供贡赋和军事支持，但在其各自的领域内，则自行建立制度，自为传承，自领军队。这样，王权得到王城内部的贵族、官僚、王畿中的氏族集团和方国的共同支撑，也受到多重的制约。商朝作为一个以王权为中心的方国联盟，其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包含了丰富的多样性。从主导的方面说，这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同时存在着渔猎经济、商业与相当发达的手工业。作为基础的农业的生产工具仍然主要是石器，和氏族作为社会基本组织机构的形态相适应，集体耕作是普遍的情况。其主要的劳动者，应是氏族成员。反映商代手工业发展水平和商代中国文化独特成就的是青铜制造业。商代青铜器制造种类繁多，规模巨大，而且兼得实用性与审美性之长。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不同，中国的铁器出现较晚，铁通过促进农业工具的变革而推动社会进化的过程到春秋战国之间方才成为潮流。这样，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青铜是体现中华文明发展成就的最主要的金属材质。它的主要器物表现不在于生产工具而是礼器和兵器，兼及手工业生产工具和其他生活用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与铁器工具推动社会发展的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国家制度文明有一个相对于生产工具发展水平来说超前的发展。中国国家政治哲学、礼仪、典章制度的发达已经肇端于此。其实，作为手工业主要部门的青铜制造业是官营的，而且主要是为国家和贵族生活而制作的，所以青铜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文化繁荣的表现。商代已经出现远距离的贸易和流通广泛的货币，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具有多种经济成分的相当复杂的社会。这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有贵族、平民、氏族公社成员和奴隶。奴隶制度和公社制度、宗法制度、官僚制度等多种社会关系体系并存，但奴隶制度并不是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基础。

商王朝控制地域之外的氏族、部族集团，在商文明壮大的同时也处于相对规模较小的区域性内聚过程中。它们在商的外缘地区与商核心区域的政治力量发生冲突，在文化上则相互交融。在商文明扩展的大趋势下，核心区域和周边区域发生频繁的战争，总的结果是使由黄河中下游的中华文明核心区域引导的文明内聚运动向周边逐步扩展。《诗经·商颂·殷武》中的“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是其写照。在与成汤伐桀十分类似的武王伐纣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周朝，在继续这种文明中心的扩展中以礼乐制度和宗法制度为中心进一步完善国家制度，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式的国家理念的建构。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总结与整理，周代所建立的国家理念成为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政治文化精神的原点。

礼乐的举行是社会、宗教观念的公开演绎，是一种由国家权力中心主导的象征性的秩序启示活动。这种依据明确的规范而经过高于现实的背景、服饰、

动作、音响渲染的组合启发社会成员在社会整体中定位的自觉。由于其功能巨大，周代的礼制内容复杂，后世称其“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精神要素是“亲亲”和“尊尊”。前者强调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上的和谐，后者强调社会等级现实基础上的秩序。经过礼乐制度的倡导，夏商时代的宗法体制没有随着国家权力的发展而消失，而是取得了和国家权力体制的适应，从而在国家制度的发展中作为其有机成分绵长地延续下来。这种制度留下了注重家族利益和根据在家族与集体中的地位为个人定位的社会传统。嫡长子继承制、对宗族延续的追求、丧服制度的严格化和分封制度等，都是周代宗法礼仪制度的主要内容。周代的分封所建立的王权政治体系与商代体制基本相同，但是周初通过分封使大批周王室成员和在推翻商朝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地方势力成为诸侯，这与商代主要以确认原有方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体制相比显然强化了王的权威，而且具有更强的武装征服的含义。周公平定各地叛乱，扫除殷商复辟势力，以及营建成周的努力等，都是加强王权的举措。西周前期，以周朝王畿为核心的华夏文明内聚运动以周国家实力为基础迅速发展，波及以山东、汉水、辽河、河套、长江中下游和青藏高原为外缘的广大区域。其方式包括对于反叛势力的征服和方国纳贡体系的建立。

周朝的中央国家机关是一个以王为中心的卿士体制。太宰、太师、太保合称三公，他们对于王有辅佐的义务和监督的权力。这种显然是从商代继承下来的传统在后代被称为“三公论道”。在世袭君主制度中，这种设置一方面体现君主的权力还受到强有力的制约，同时也意味着由卿士提供的对政治统治精神的一贯和稳定性的保障。这些卿士，主要出自王的宗族，也可以出自靠能力和功勋取得治理国家资格的普通人。卿士阶层的主体是世袭的，这体现了氏族制度在周国家体制中的残留。同时，这个行政体系本身主要是由世袭的职业国家管理人员组成的层级官僚系统，因而具有一种贵族官僚制度的色彩。后世的官僚制度，扬弃了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成分而继承了周代行政体制中的大量名目。周代的地方诸侯国直接仿用周中央王朝的职官体系，这表示周王的权威凌驾于诸侯之上但并没有形成对诸侯国内部事务的统一权力。《吕刑》代表的周代法典，以身体伤害方式的惩罚为主，和世界上古文明的大多其他法典系统类似。但是周代礼、刑并用，对于不同阶层的人，使用不同的规则加以控制和约束，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的一个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独立无法实现，而是从属于行政权力。周的常备军事系统比商代完备，诸侯的军事行为受王的严格控制。这显示王的权力比较商代有所强化。

王权在土地制度上的体现是一种类似国家主权的抽象所有权。《诗经·小雅·北山》中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达的是王代表国家对于整个领土和臣民的主权——在整个王国之内，对于土地的具体

占有的合法性以王对于全国土地的最终但抽象的权利为前提，自王以下对于土地的具体占有，则通过一种贵族等级分封制来实现。王直接占有王畿，诸侯和卿大夫以获自王封的名义占有自己的领地，诸侯国卿大夫以获自诸侯分封的名义占有领地，士的土地则来自卿大夫的封赏。以当时的农业文明和公社制度传统为基础，这种对于土地的占有和对于耕作这些土地的人民的占有是一体的。早在殷商时代就已产生的井田制度这时发展到完备的形态，在国家体系中表现为被按层级占有的土地在各自领主的范围内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以其产品供给包括领主消费在内的公共所需。私田是由公社内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来耕种的土地，这些土地要定期重新分配，产品主要供给生产者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诗经·小雅·大田》中记载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体现着这种公有和私有制度的统一。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层级分割，对于土地的完整的私人所有权并不存在，所以土地不可以作为私有财产来买卖。这种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层级分割，作为一种观念、制度和传统，长期地渗透在中国古代历史各个时期的土地关系中。

中华文明在周代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建树是由《周易》集中体现出来的宇宙和哲学观念系统的形成。《周易》是对上古卜筮经验的总结和再发明，体现了从原始自然崇拜向系统宇宙观念和哲学的过渡。这部典籍把自然现象抽象化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基本卦象，并以这些抽象化了的自然概念为基础演绎宇宙秩序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关系。自然界的相生相化相克，在这里构成了一个充满变易而圆通的有规律的体系，它是中国古代整体思维和辩证法精神的渊源。关于宇宙的分析性思考则体现在阴阳五行学说之中。这种学说把世界分析归纳成为五种要素：金、木、水、火、土。它仍然没有超出直接观察和知觉体验的阶段，还未成为科学的认识，但是对于自然界的分析与归纳倾向已经显露出来。周代知识的传承在国家主持下主要在贵族阶层中进行，这就是所谓的“学在官府”。学习的要旨以服务于国家为目标，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这种官学体制局限于国家行为并且具有鲜明的特权主义特点，它实现了当时的知识传承并且留下了中国文化中注重精英教育的传统。

周王的权威在王朝国家体系长期运作中逐渐衰败，在出现严重腐败和权力斗争的情况下呈现危机。王朝为了解决内部危机而求助于周边的势力，又恰好为受到周文明吸引的周边部族内向发展提供了契机。公元前 770 年犬戎的入侵迫使周平王把京城东迁成周。这次迁徙虽然避免了周王朝的灭亡，但从根本上动摇了周王的权威。不过，这个变动主要表现在中央王权的削弱，而不是文明的衰落，所以接下来的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多元的、充满竞争因而又充满创造性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古典文明在精神境界上日益走向成熟。这个